

算法时代的劳动焦虑

和当年万众齐讨富士康的尖锐声音相比，平台企业道德耻感的低下令人齿冷，监管部门出手整治的觉醒还没有产生足够的震慑。

中国的700万外卖骑手，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被关注。

网络热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的讨论持续了半个多月，仍然没有止息的迹象，反而引来更多的专业学者相继介入，这在话题频繁更迭的公共舆论场里并不常见。

平台算法“压榨”、骑手50分钟违章6次、上海每2.5天就有一名外卖员伤亡……这些新近引爆舆论的事实和问题，从外卖骑手这一新兴就业群体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但是，在AI技术越发成熟的今天，外卖骑手试图寻求喘息的灰色地带被挤压得越发稀少，冰冷的数据直接连着严厉的惩罚，一个新兴就业群体的劳动焦虑终于升级成算法时代的公众焦虑。

面对外卖骑手的困境，有的声音把“算法”当成了“背锅侠”，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把问题的核心从价值观淡化成了信息技术。不消须臾，理智的反对声音就已经出现——技术没有价值观，但技术背后的人必须要有。在花哨的新词汇新概念背后，逃不脱的还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主张与保护。

平台经济的兴起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为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但这并不会彻底解决一直处在合法与非法边缘的劳动权益问题。在“算法”的“压榨”下，外卖骑手头顶高悬的惩罚措施，迫使他们在车水马龙的城市街头狂奔，不得不把自己一次又一次置身于危险的隐患之中。与政府高度关注的工厂安全生产隐患相比，它们并没有过多的差别，都是在用更大的事故几率“兑换”效率的提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唯一不同的是，工厂没有办法推脱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更没有办法逃脱严厉的法律惩罚，互联网平台却可以做到这一切，仅仅承担相比起来微乎其微的责任，有时甚至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外卖骑手的每一次“生产事故”，都是这些奔忙求生者自己的疏漏和过错。

一方面是门槛聊胜于无的就业大门让外卖骑手几乎找不到个人的存在感，另一方面是平台寡头霸占着“游戏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如果再加上劳动法律、政府管理、商业伦理道德这样的第三方约束既低效又散漫，最终使这场有关互联网时代劳动权益的博弈变得毫无悬念。就像在这场有关外卖骑手困守系统的讨论中，媒体学者的批评洞察深邃，平台企业的表态却轻描淡写，最能强硬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政府权力，反而有些欲说还休。

84年前，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在他的代表作《摩登时代》中，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展现了工业初时代的工人生活，让人们记住了单调重复的机械作业导致工人患上精神病的场景。10年前，富士康员工“××连跳”悲剧的发生，显露出劳动者真实生活的残酷的一面。10年后的今天，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化过程中、平台经济浪潮下外卖骑手的困境，几乎就是当年流水线工人无奈挣扎的翻版重演。但是，和当年万众齐讨富士康的尖锐声音相比，平台企业道德耻感的低下令人齿冷，监管部门出手整治的觉醒还没有产生足够的震慑。

在媒体的描摹里，如今的外卖平台巨头的那位创始人，曾经也有过温暖芸芸众生的情怀。他看着北京五道口的熙攘人流这样说：“做互联网创业的人，很少考虑怎么去帮助这些人，这些普罗大众。我们就是要帮助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也是属于我们的机会。”今天，属于创始人和资本的机会变成了漂亮的财报，当初帮助普通劳动者改变命运的情怀，还有多少余温？

尽管舆论场里热闹非凡，骑手与平台，这场数字时代的劳动博弈，胜败结果显然毫无悬念。但是，在席卷社会生活的信息时代大潮里，如果无人能够解救“困在系统里”的劳动者，我们奋力奔跑的目的和意义，又在哪里？

